

新疆民族文化出版五十年

贺灵

新疆自古以来为多民族部落、多部族和多民族繁衍生息之地。新疆和平解放以后，党和国家为了发展新疆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开始从人力、物力、财力和智力逐步加大投入，以使广大少数民族群众从旧中国造成的落后、愚昧状态中解脱出来。其中创建出版机构就是一个文化意义和现实意义都比较强的一项举措。50多年来，新疆民族文化出版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文化性不强到富具文化意义，到目前已成为文种齐全（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锡伯六种文字）、机构分布合理（计10余家出版机构：新疆人民出版社、新疆教育出版社、新疆青少年出版社、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新疆人民卫生出版社、新疆大学出版社、伊犁人民出版社、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新疆电子出版社、新疆音像出版社）的文化出版系统，并为新疆各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做了大量实质性的工作。回顾这50余年新疆民族文化的出版历史，可以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和理解党和国家为发展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化事业所做的不懈努力，以及新疆各民族的文化借助出版这一文化媒介而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事实，并为以后的继续发展、变化提供借鉴。新中国的新疆民族文化出版事业与清朝中期至民国年间的有关这方面的文化活动存在有机的联系，因此，适当追溯其发展渊源，对新中国成立之后新疆民族文化出版业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帮助。

一

自古以来，新疆（清末之前称西域）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远离中原文明地带，偏处交通和信息极度不便和闭塞的边陲，经济、文化十分落后，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各民族人民基本处于愚昧状态。特别是由于各民族社会发展形态各显差异，即有的处于氏族制末期阶段，有的处在农奴制社会，有的处于不甚发达的封建制，而没有哪一个民族接触过近代工业文明，这造成了各民族之间文化发展差异的悬殊。从社会文化而言，旧中国的新疆根本谈不上公共文化投入，更谈不上什么具有实质内容的文化机构建设。但是，新疆自古以来呈现为文化资源具有一定丰富性的地区之一，自汉代始在历代各朝的正史及其他著述中，对西域历史、民族、地理、文化等的记载愈来愈多，记述范围越来越广。史至清朝，西域更是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之一。因为清时的西域其文化发展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条件孕育和创造的狩猎文化、草原游牧文化、绿洲农耕文化、手工业文化、城镇商业文化等越来越成为国内外学者探讨的重要范围。尤其是富具典型意义和地域性特点的丝绸之路文化的概念被提出并逐步为国内外学术界肯定之后，人们对西域历史、民族、文化、地理的认识日渐深刻，而且通过丝绸之路文化将西域（新疆）与中亚、西亚甚至欧洲文化及其发展史联系起来，西域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单元区。清政府重新统一新疆天山南北之后，随着一批批被贬官员及文人志士的不断入疆，新疆的文化面貌不断被诉诸于文字而为人们所了解。虽然当时的新疆很少有正规的图书刻印机构，但是，关内的一些图书刻印机构自乾隆前后始将有关新疆的文化资料也作为其刻印资料之一，陆续刻印发行，使有关新疆历史、地理、文化、民族等方面的读物多了起来。可以说这是有关新疆读物出版的开端。综其内容有汉代至明朝正史中关于新疆的各类资料，还有不少清代陆续形成的文献、论著及其他资料。如《二十四史》中涉及西域及其古代民族的传记及历代个人著述等，其中清朝时期形成的最多。据有关资料统计，清朝时期陆续印行的自汉代至清代关于新疆方面的资料本近200种，若加上部分间接资料，则超过200种以上。到了清末民初，新疆的历史与全国的历史一样翻开了新的一页，有关新疆方面的图书刻印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清末成立了新疆官书局，并开始刻印有关书籍。国民党势力全面进入新疆之后，其各类文化人士也跟着进入新疆，在全疆各地进行民族、

经济、政治、文化、民俗、宗教等调查和采风。与此同时，自清代以来俄国、日本、瑞典、英国、法国、德国等国有关人士（其中含探险家、地理工作者、历史学者、文化间谍、旅游爱好者等）到新疆各地进行探险、调查、采风、谍探之后在国外出版的调查报告、专著、游记、日记等逐渐为国人所了解，这更促使了民国时期人们对新疆各方面的关注，使越来越多的新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宗教等情况通过各类出版物为国内外所知。可以肯定，民国时期是新中国成立以前有关新疆各方面的各类读物面世最多的时期。这一时期，反映新疆问题的关内出版物的门类越来越广泛，诸如政治、经济、现政、军事、地理、民族、民俗、文化、水利等均有涉及。而涉足新疆问题出版物的关内出版机构，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影响，诸如商务印书馆、上海太平书店、北平文化学社、中华书局、南京仁声书局、正中书局、建中出版社、时代出版社、独立出版社、重庆商务印书馆、上海大东书局、上海申报馆、上海世界书局、武定同文印刷社、上海引擎出版社、重庆安重印书局、上海文献书局、中联出版社、海外通讯社、重庆中正书局、重庆南方印书馆、香港海外书店、改造出版社、上海中华建国出版社、世界出版社、北京同和书局、上海开明书店、东南出版社、重庆交通书局、重庆文信书局、浙江图书馆、上海芷江出版社、湖北官书局、生活书店等不下四五十家。20 世纪 40 年代，新疆成立了迪化出版社、迪化新疆人社等几家出版机构并进行出版业务。另外，新疆日报社、反帝会、各民族促进会等也逐步参与印制有关文件、材料、图书等文化活动。民国年间印行的各类书籍，很多都涉及了新疆的民族、宗教、文化等情况，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对新疆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新疆民族文化出版事业的开展和发展提供了借鉴。

清朝覆亡，建立民国，新疆人口大量增加，各地之间的民族和人口流动大大加强，新疆的民族、宗教、文化、地理、经济、现政等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这时期陆续印行的 100 多种各类读物其中很多针对性强，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由于它们均为民国间印行，且纸张差、印制质量次、发行量少、流传范围狭窄等因素，这些读物多已不为人所知，有些仅仅在有关图书馆和研究部门的资料机构中有保存，但基本都有不同程度的损毁。下面根据有关资料，对其中较有价值的部分仅作书目介绍。例如：《中国经营西域史》、《新疆》、《现在的新疆》、《新疆概观》、《新疆省》、《新疆经营论》、《今日新疆》、《新疆概述》、《新疆问题史的分析》、《新疆之民族与宗教》、《伊斯兰教之理智研究》、《伊斯兰教概论》、《伊斯兰教志略》、《新疆刍议》、《新疆问题》、《视察新疆报告》、《新疆观察记》、《新疆杂记十二篇》、《新疆研究》、《新疆内幕》、《盛世才如何统治新疆》、《中俄边境之新关系》、《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伊犁定约中俄谈话录》、《接受伊犁节略》、《新疆伊犁外交问题研究》、《伊犁兵要地理》、《南疆战史》、《历代屯垦考》、《历代屯垦研究》、《战时移垦边疆问题》、《回族文化简史》、《高昌壁画精华》、《西北种族史》、《西北民族研究》、《西域史族新考》、《匈奴民族考》、《西突厥史料》、《辽金时蒙古考》、《蒙兀史记》、《蒙古史略》、《哈萨克入甘记》、《中国历代经营新疆述略》、《新疆纪略》、《补过斋文牍》、《新疆与新疆事变》、《坎巨堤述略》、《伊犁河西》、《新疆三区事件》、《新疆风云》、《伊犁事变》、《伊犁事变纪略》、《伊犁烟云录》、《新疆十年》、《新疆访古录》、《中国西部考古记》、《我的探险生涯》、《亚洲腹地旅行记》、《新疆古城探险记》、《罗布淖尔考古记》、《边疆异俗漫谈》、《新疆的民族与礼俗》、《西北民俗专号》、《新疆风物》、《南疆风光》、《中国疆域拓展史》、《中国疆域沿革略》、《新疆吐鲁番盆地》、《塔里木盆地》、《西域地名》、《西域地名今译》、《新疆游记地理》、《西北远征记》、《新疆印象记》、《新疆游记》、《新疆纪游》、《新疆沙漠游记》、《西北行》、《新疆古今人物观》、《边疆人物志》、《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等。从上可以看出，民国期间，各出版机构及文人志士为新疆及其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所作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它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新疆民族文化出版事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

1949 年新疆和平解放，新疆 13 个世居民族从旧中国废墟中走了出来，同全国人民一起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但是，旧中国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各民族群众仍处于愚昧之中的新疆。面对这种情况，党和政府在进行社会改革、全面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又投入人力、物

力、财力和智力，大力开展文化建议，使各族人民尽快从愚昧状态中苏醒过来。其中成立图书出版机构是首先采取的文化建设举措之一。1950年，党和政府顺应全国图书出版机构建设的有利形势，决定成立新疆省自己的出版机构，经过数个月的筹备，于1951年成立新疆首家综合性图书出版机构——新疆人民出版社；1956年又成立新疆教育出版社和新疆青年出版社（1985年易名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76和1977年先后成立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和伊犁人民出版社；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先后成立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新疆音像出版社、新疆大学出版社、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后两家系由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析出而成立）、新疆电子出版社。至此完成了我区以新疆人民出版社为“龙头”和中心的六种文字（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和锡伯六种文字）的多门类出版系统。至2005年，这些出版社先后出版六种文字的各类读物（包括音像制品）3万种左右，发行5亿余册（张）。形成了我区独特的出版物品牌体系、稳定的读者群、区内外优秀作者队伍以及自己的区域性出版文化。回顾50余年来我区的出版历史，可以说取得了辉煌成绩，为新疆各民族文化的发 展做了大量工作，但也有许多经验教训可资总结和汲取，以指导往后的出版实践。

新疆50多年的图书出版事业，与其他行业的发展一样，经历了曲折发展的历程。但图书出版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产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自己的特点，即表现出较浓厚的意识形态特点，因而，该产业始终为当地党政部门所重视。尤其是新疆地区作为多民族、多宗教、多种文化形态的特殊地区，图书出版始终保持着其基本的定位和方向，把发展民族文化、弘扬新疆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新疆“两个文明”建设作为社会责任和义务，几十年来取得了显著成绩。可以说，新疆13个世居民族文化的发展，与本地区图书出版所起的社会作用密切相关。这从50多年来所出版图书门类的逐步拓展、图书内容的日渐丰富以及每个阶段图书选题的侧重点上便可以体现出来。毫无疑问，新疆各族人民的文化发展是与本地区图书出版的发展基本同步，反映了图书出版事业所固有的文化影响力和辐射作用。

新疆民族文化出版历史明显呈现阶段性。1951年至文化大革命为第一阶段。在该阶段，单纯从出版物的门类和内容而言，是本地区出版业的初创、出版物直接表现为为政治和社会现实服务的阶段。新疆和平解放初期，南北疆各民族地区开始土地改革，农村地区普遍推行了新形式的生产组合，并广泛进行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普及，清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民族压迫政策和歧视思想。为此，新疆人民出版社成立后几年图书出版的主要任务是为当时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及政治导向服务。当时，旧制度刚被推翻，南北疆各地农村和城镇人民亟待进行新时期的政治思想教育，农业生产方面也亟待提高耕种、施肥、收获、水利等方面的技术水平。此外，土地改革、农村医疗卫生、养殖等方面也急需一大批人才，以配合党在农村的工作。针对社会实际，该社大力配合党在新疆的工作重点，紧紧围绕农村工作安排选题计划。先行设立的维吾尔、哈萨克、蒙古三种少数民族文字在建社几年着重安排了翻译读物（主要是汉译民）。如哲学、政治理论方面有《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毛泽东著作；为配合当时农村的建政、土地改革、减租反霸、合作化运动等，包括汉文等各文种都安排有关内容的读物及时出版发行，如《减租条例》、《减租工作手册》、《新疆省农村减租条例》、《建政文件汇集》、《土地改革手册》（多集）、《农村合作社通俗讲话》、《选举工作手册》、《农村生产互助合作课本》等。1951—1956年，新疆人民出版社还承担了各类教材的出版任务，如以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锡伯（1954后成立该文字编辑室）、柯尔克孜（1956年设立该文字编辑室）六种文字出版《高小算术读本》、《高小常识课本》、《语文》、《小学文法课本》、《本国地理》等。为配合农村中青年扫盲教育和提高农村干部文化素质，还陆续出版了有关通俗读物。如《工农字母课本》、《工农识字课本》、《中国革命读本》、《青年团基本知识教材》、《经济建设常识读本》等。此外针对解放初期分派到南北疆各地农村工作人员的思想素质、文化和政策水平参差不齐的实际情况，新疆人民出版社1951年就创办了《新疆宣传员》（月刊），每月用维吾尔文和汉文同时出版，发行到农村宣传员手中；创办《前进》杂志，用维汉两种文字出版，主要登载党的方针、政策、农村工作知识、农村

工作动态、新人新事等。经过 1951—1953 年的努力，新疆人民出版社的出版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实现了为社会服务的目的，收到较好的社会效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同时，各族人民对图书门类的需求也越来越扩大。为此，1954 年起该社逐步拓展选题范围，图书品种又逐年增多，凡哲学、政治理论、法律、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历史、地理、农牧业、科教卫生、财政、经济等内容读物均安排出版，并达到一定的规模。其中发展较快的是文学艺术读物的出版。但从总体上看，少数民族的图书 80% 以上为译作，即从汉文翻译成民文的图书。1954 年以后本社又加大期刊杂志的创办，在继续出版 1953 年创办的汉文《新疆画报》的同时，用维吾尔文开始出版该刊，并定为月刊。当年又用维吾尔、汉、哈萨克三种文字出版《新疆文艺》月刊。1956 年汉文版《天山》（文艺期刊）和《新疆农业科学》（月刊），哈萨克文版《曙光》期刊出版。1958 年，维吾尔文版《红旗》（半月刊）、《新疆妇女》（月刊）、《新疆红旗》（半月刊）、《塔里木》出版；托忒蒙文月刊《启明星》创刊。1959 年出版维吾尔、汉文版《支部生活》、汉、哈萨克文版《新疆红旗》；创办托忒蒙文版《学习》（月刊）。1960 年出版维吾尔文版《新疆农业科学》。1962 年出版维吾尔、汉、哈萨克文版《新疆文学》。1964 年出版维吾尔文版《文学译丛》（月刊）和哈萨克文版《支部生活》（半月刊）。至此，本社各文种期刊杂志品种已达 10 余种，门类已含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综合等。在此期间，蒙古文和哈萨克文个别期刊因发行和读者群萎缩等因素而时停时出，维持出刊局面已显艰难。此外，自治区文联等与本社合办期刊的单位，又开始独立接办原由其创办的期刊杂志，故文化大革命前夕，包括维吾尔、汉等文字的文学艺术期刊杂志多不再由本社出版了。

自 1959 年始，“左”的思潮开始影响出版界，政治理论、经济、文学艺术等类图书选题开始注重突出“政治”，搞空洞宣传，脱离实际，违背科学，造成了出版资源的浪费。但在农牧业、科学技术、医药卫生方面出版了不少通俗读物。60 年代初，新疆人民出版社柯尔克孜文编辑室和锡伯文编辑室同时下放基层，到 80 年代初才恢复。

1966—1976 年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为我区民族文化出版历史的第二阶段。在该阶段，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文出版的各类图书品种达 5000 余种，但基本上都表现为极左的阶级斗争产物，根本谈不上文化知识性，几乎被历史所否定。而且，这期间只维持着维吾尔、汉、哈萨克文双月刊《新疆文艺》和不定期维吾尔文刊物《红小兵》等的出版。但其内容失去了文化知识性特点，成为左倾思潮的产物。

文化大革命结束至 80 年代初，由于社会各领域尤其是思想文化领域正处于混乱之后的拨乱反正阶段，我区的出版形势与全国的出版形势一样，仍在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出版物中仍存在左倾思想影响，只有部分出版物受到读者的欢迎，如古典名著、科技、医药卫生、农业技术等读物。这一时期表现为我区民族文化出版史上的第三阶段。在该阶段，50 年代形成的我区独具特点的六种文字的出版体制未完全恢复。

80 年代初至 90 年代前期，是新疆的民族文化出版事业繁荣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新疆民族文化出版史的第四阶段。在这一时期，全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作品的翻译再创作、民间文化的搜集整理、古籍整理等文化活动异常活跃，加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现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大气候极大地促进了出版业的迅速发展，打破了在新疆几十年来只有新疆人民出版社、新疆教育出版社、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等几家出版机构唱主角的局面，新疆大学出版社、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等出版机构相继成立，形成了新疆出版领域的专业化分工。作为出版领域的龙头和中心—新疆人民出版社，这时更显示出了其人才优势、资源优势和文化积累优势。在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即招收大专院校毕业生的新编辑力量）的同时，还为新成立或扩展出版业务的数家出版社，如新疆青少年出版社、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输送编辑和管理人员，以帮助扩大其出版规模。从出版物的规模、门类、文化价值以及作者队伍、读者群等方面看，在该阶段，对新疆民族文化的出版方面，新疆人民出版社仍然是主力军，它所起的仍然是中坚作用。80 年代初，本社又恢复了锡伯文编辑室和柯尔克孜文编辑室，使该社传统的六种文字出版体制得以重新完善。10 余年间，以该社为中心的各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六种文字的各类读物数千个

品种,一大批知识含量高、资料性强、学术水平高的传世读物陆续被推向社会,广泛受到国内外读者的欢迎。如西域或新疆历史系列、新疆各民族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系列、新疆民族文化系列;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译著系列和世界文学名著译著系列;各民族文字的外国儿童文学名著译著系列;各民族文字的新疆各民族“五套丛书”系列、各文种辞书系列等。自1980年始,在图书出版良好形势的推动和国家鼓励办期刊的形势下,新疆人民出版社各文种期刊品种数也一年比一年增加,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本社先后恢复出版、新创办和间接办的期刊达40余种,如1980年增加10余种,1981年增加15种,1982年增加2种,1983年增加3种,1984年增加3种,1985年增加7种,1986年增加6种,1987年增加2种,1988年增加1种,1989年增加2种。其中较有影响的各文种期刊有:《边塞》、《语言与翻译》、《新疆文学》、《新疆民族文学》、《文艺译丛》、《新疆民间文学》、《文学译丛》、《源泉》、《新疆艺术》、《塔里木》、《新疆文艺》、《绿草》、《新疆妇女》、《曙光》、《汗腾格里》、《天山少年》、《启明星》、《前进》、《中国西部文学》、《地平线》、《外国文艺》、《乔力潘》、《丝路游》、《民族作家》、《读者文摘》、《锡伯文化》、《世界文学选译》、《华夏少年》等。其门类已涵盖文学艺术、社会科学、语言文字、少儿、科技、农牧业、综合等。

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经济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我区民族文化出版事业受此体制转型规律的影响,由繁荣期转入了自我调整、寻求持续发展新路的时期。这也是我区民族文化出版史上的第五个阶段。在该阶段,我区各出版机构尤其是出版“老大”——新疆人民出版社,一度出现了图书出版滑坡现象,出版资金一年比一年短缺,国家投入逐年乏力,使具有学术性、专业性、知识积累性图书的出版遇到严重困难。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各出版社都积极探索改革的路子,加强经营管理,努力实现由数量规模向优质高效阶段转移。鼓励编辑和管理人员增强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优化选题,降低成本,努力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但是市场经济的规律是无情的。在近十年的出版实践中,各出版社对社会价值较高图书的出版仍然很乏力,只有少量得以安排出版。其间各出版社的发稿量虽也有逐年增长的情况,但其中90%左右均为内地“书商”的来稿,缺乏文化价值。此外,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图书出版形势的不断变化,我区各出版社期刊杂志的出版形势也每况愈下。首先,不少文种的文学艺术刊物开始由原创办单位独立主办,不再由出版社出版;其次,许多杂志先后被迫停刊或停办。致使1995年后只有维吾尔文《半月谈》、《读者之友》,汉文《丝路游》,锡伯文《锡伯文化》等少量期刊杂志由各类出版社出版。

自2004年始,我区各出版机构顺应国家对出版事业各项政策的调整以及改革的深入,主动加强了出版管理,力求优化选题,树立品牌意识和精品意识,努力提高编辑人员各项素质和管理水平,进一步加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拒绝格调不高的图书,少出平庸书,多出对各族文化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和有利于我区“两个文明”建设的好书。目前,各出版社的出版经营活动正在进入良性发展的路子。

三

新疆是经济文化欠发达的地区。新中国成立前,世居的13个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思想意识等都处于落后、愚昧状态。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陆续成立十余家出版机构,其宗旨是为了更快发展各族文化,弘扬新疆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各族精神文明水平,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思想文化保障。50余年来,以新疆人民出版社为龙头的各出版机构,基本上均以上述宗旨为出版经营的立足点,并以新疆民族文化(新疆地域文化)为重要出版资源,在各自的分工范围内,先后推出了近2000种具有地域文化特色和民族特点的各类读物,使其成为衡量我区出版业成绩的硬性指标。回顾50余年来我区出版业之所以能够形成地区性出版物的品牌体系、区内外优秀作者队伍、稳定的读者群以及地域性出版文化,如果没有民族文化(或新疆地域文化)这个丰富的出版资源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各家出版社陆续推出的具有文化和知识积累价值的近2000种各类出版物,也充分体现了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出版业所肩负的重大社会责任和义务。对一个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图书出版机构而言,它先后推出的具有文化、知识积累价值的各类品

牌读物是其出版历史的主线,失去了这个主线,其历史将无从谈起。新疆出版业的辉煌历史,是由其打造的品牌读物创造的。因此,为了全面反映我区出版业 50 余年中所取得的成绩,下面以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读物为主线,分门别类地作一重点介绍。经过条分目别得知,在上述近 2000 种读物中,可资重点介绍的有历史、民间文学、艺术、译著和古籍读物。通过这些读物,不仅可以全面了解新疆出版业创造的文化价值,还可以认识新疆各民族及地域历史、文化的内涵。

新疆自古以来为多民族、多部族和多民族游猎、游牧和耕种之地,数千年来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狩猎文化、草原游牧文化、绿洲农耕文化、城镇手工业文化和商业文化等。而且,新疆作为古代丝绸之路重要通道以及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之一,其历史不仅悠久,而且呈现丰富多彩,给史学工作者创造了广博的驰骋空间。自清末以来,国内外史学工作者及其他文人儒士,为新疆地方史及各民族发展史做了很多研究工作和资料整理工作。这为出版业提供了丰富的出版资源。对新疆地域历史和民族历史的出版作出重大贡献的是新疆人民出版社。该社始终以发展本地文化为己任,把组织史学工作者修史著书及编辑出版作为其出版工作重点之一而常抓不懈,取得了辉煌成绩,使地方史和民族史读物成为本社出版物的最具特色的领域。

20 世纪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国家为了全面了解和掌握我国各民族的历史与现状,开展了全国范围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在新疆,通过几年的调查以及查阅各类文献资料,掌握了新疆地方史和民族史的基本情况,随即陆续写出了各民族简史简志合编、各自治州县概况以及相关的调查资料汇编。如《南疆农村社会》、《阿勒泰牧区调查》、《木垒哈萨克自治县概况》、《焉耆回族自治县概况》、《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概况》、《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概况》、《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概况》、《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概况》、《塔什库尔特干塔吉克自治县概况》、《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概况》等。上述图书均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另外,《维吾尔族简史简志合编》、《哈萨克族简史简志合编》、《锡伯族简史简志合编》等,由内部铅印发行。这些资料和图书是新疆地方史和民族史方面的首批著述和准确性较好的调查资料。它拉开了共和国成立后对新疆民族史和地方史研究的序幕,为日后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初步基础。而且,通过这些读物,人们对我区各民族有了初步认识 and 了解。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新疆民族史和地方史的研究也迎来了新春。新疆人民出版社积极配合研究部门的工作,及时安排他们的成果出版。自 1978—1990 年,以新疆人民出版社为首的有关出版社,相继推出了六种文字的有关民族史和地方史著述近 170 多个品种。其中汉文版的有:《新疆历史论文集》、《中西回俄历表》、《伊斯兰教史话》、《新疆文史资料选辑》(1—22)、《新疆简史》(1—3)、《南疆农村社会》、《喀什噶利亚》(译著)、《新疆历史论文续集》、《〈明实录〉瓦剌资料摘编》、《乌孙研究》、《塔吉克族简史》、《新疆考古三十年》、《左宗棠与新疆》、《新疆历史人物》(1—4 集)、《乌鲁木齐史话》、《十八—十九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上、下)、《西域史论丛》(第一、二、三辑)、《新疆历史丛话》、《维吾尔族社会历史调查》、《塔吉克族社会历史调查》、《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二编)、《北庭史地研究》、《新疆建置沿革与地名研究》、《西回鹘史研究》、《五代回鹘史料》、《柯尔克孜族简史》、《西蒙古史研究》、《巴里坤哈萨克族风俗习惯》、《柯尔克孜族风俗习惯》、《喀喇汗王朝史稿》、《〈清实录〉准噶尔史料摘编》、《通俗新疆史》、《卡尔梅克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焉耆回族自治县概况》、《神秘的古城楼兰》、《俄罗斯族简史》、《柯尔克孜族社会历史调查》、《哈萨克族社会历史调查》、《哈萨克族简史》、《旧中国新疆石油史料辑要》、《西域史地论文资料索引》、《中国和伊朗关系史稿》、《锡伯族历史与文化》、《吐鲁番古代文明》、《维吾尔族简史》、译著《天山游记》、《伊吾保卫战》、《林则徐在新疆》、《高昌楼兰研究文集》、《锡伯族研究》;修订之《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概况》、《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概况》、《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概况》、《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概况》、《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概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概况》、《新疆简史》(第一、二册)、《碧血洒天山》、《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概况》、《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概况》。维吾尔文有:《新疆文史资料选辑》

(1—29)、《新疆历史文物》、《张骞的故事》；译著《西域文化史》、《中亚简史》、《新疆简史》(1)、《辛亥革命在新疆》、《林基路》、《陈潭秋的故事》；译著《穆罕默德传》、《喀什噶利亚》、《简明喀喇汗王朝史》、《塔吉克族简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概况》、《简明喀喇汗王朝史》、《塔塔尔族简史》、《阿古柏伯克传》、《乌孜别克族简史》、《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概况》、《五军的革命历程》、《安宁史》、《新史记》、《史记——二十四史中亚资料汇编》、《汉维对照历史词典》、《喀喇汗王朝国家组织》。蒙古文有：《蒙古族简史》(由内蒙古胡都木蒙文转写成托忒蒙文)、《圣武亲征录》；译著《新疆简史》(上中下)、《卫拉特历史文献》、《蒙古史——成吉思汗与他的继承者们》、《蒙古秘史》、《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概况》、《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概况》、《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概况》、《卫拉特研究试探》、《卡尔梅克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锡伯文有：《锡伯族迁徙考记》、《锡伯族简史》、《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一、二)、《锡伯族历史资料拾零》、《敦吉纳见闻录》、《汉亚依拉克之战》、《锡伯族名人录》。哈萨克文有：《新疆简史》(上、下)、《中国通史纲要》、《哈萨克族简史》、《西域与乌孙国》等。20世纪90年代是新疆地方史、民族史研究出现转折的时期。研究工作的兴衰也直接影响了新疆人民出版社历史类读物的出版。20世纪90年代前五年,新疆社会科学研究部门,继续加强对新疆地方史和民族史的研究,先后完成了数个自治区级科研项目,还有不少个人项目陆续推出。其中的不少项目被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据统计,五年间出版地方史和民族史专著、文集、资料集等50多部。具体如下:1991年维吾尔文出版译著《新疆简史》(第三册)、《马可波罗游记》、《新疆文史资料选辑》(30)、《元朝著名维吾尔族人物简志》,汉文出版《西域研究书目》、《巴楚史话》、《元代维吾尔哈刺鲁资料辑录》、《佛国于阗》、《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新疆》(《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蒙古文出版《土尔扈特部蒙古万里归国记》,锡伯文出版《锡伯族历史论文集》;1992年维吾尔文出版《新疆文史资料选辑》(31—33)、《中国塔吉克族文化》,汉文出版《盟国军援与新疆》、《新疆文史资料选辑》(24)、《中国少数民族论著索引》、《新疆与内地关系史》、《卫拉特蒙古简史》(上)、《喀什噶尔史话》,蒙古文出版《卫拉特史迹》;1993年维吾尔文出版《新疆文史资料选辑》(34)、《维吾尔族历史史料目录》、《叶尔羌国简史》、《中亚史》,汉文出版《锡伯族史》、《新疆历史词典》,哈萨克文出版《哈萨克历史及其民俗概论》,柯尔克孜文出版《柯尔克孜族简史》,锡伯文出版《锡伯族历史新解探》;1994年维吾尔文出版《新疆文史资料选辑》(35)(37),汉文出版《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简史》、《回族知识词典》、《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新疆文史资料选辑》(36)、《新疆民族史研究》、《中国丝绸之路辞典》、《新疆对苏(俄)贸易史》、《重返喀什噶尔》,哈萨克文出版《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概况》,锡伯文出版《锡伯营职官年表》;1995年维吾尔文出版《回纥史》、《隋唐时期维吾尔族著名人物志》,汉文出版《锡伯族百科全书》、《新疆民族辞典》、《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楼兰文化研究论集》、《中国边疆古籍题解》等。1996年以后,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文化部门、科研系统及出版界都开始面临经济困难,科研成果难以出版,出版社投入乏力,使理论性、学术性及知识积累性图书出版出现很大困难。因此,1996年之后,图书品种萎缩,计划书投入逐年减少,商业性出版逐步兴盛。据统计,近10年中有关新疆地方史和民族史读物品种比前大有下降,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字的下降更多。如,主要有如下20余种:汉文出版《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上中下)、《西北民族词典》、《新疆古代社会生活史》、《新疆民族史》、《卫拉特蒙古简史》(下)、《哈萨克历史与文化》、《哈萨克历史与民俗》、《民国新疆史》、《新疆民族关系研究》、《中共新疆地方史》、《伊犁史简明读本》、《20世纪新疆史研究》、《锡伯族研究文集》(第一辑)、《中亚通史》(1—4)、《林则徐在新疆》(1—4)、《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光绪宣统卷》、《吐尔扈特东归历史文化论文集》、《吐鲁番史》、《伊犁历史与文化》、《哈萨克文化研究》等。此时,作为与新疆地方史和民族史具有交叉性的汉文版《丝绸之路研究丛书》(14种)、《西域探险考察大系》(12种)、《亚洲探险之旅》(10种)和《探险与发现》(10种)都陆续出版发行;维吾尔文出版《中国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论丛》(1)、《纪念新疆三区革命文集》、译著《重返喀什噶尔》、《南疆维吾尔族》、《高昌回鹘汗国文化》等;蒙古文出版《卫拉特历史名人》、《十七世纪卫拉特史研究》等。这五年中,出书的特点是,专题性、

知识积累性读物占一定的比例,这是因为,90年代中后期立的部分科研项目,结题后得以出版,并受到了有关部门的资助。但从数量上看,学术性、理论性、专题性研究著作的出版难问题已显而易见。这一问题已引起各方面的重视。

民间文学是民间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近现代少数民族创作文学的源泉和母体。尤其是新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创作文学,均与各自的民间文学具有很紧密的联系。我区各民族民间文学的内涵中都包括民歌、故事、谚语、格言、谜语等形式。民间文学基本由口头相传,随着时空的变化会有失传的危险。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抢救这些文化资料,党和政府以及各级文化部门做了很多实质性的工作,使我区各民族民间文学资料大部分得到了搜集整理。新疆各出版机构为这项工作做了大量工作,自1951年始,先后用维吾尔、汉、哈萨克等六种文字出版各民族民间文学作品达二百四五十种。其中90%以上作品是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953年至文化大革命前夕,该社先后用维吾尔、锡伯、蒙古、汉、柯尔克孜文出版10余种作品:《维吾尔民间诗集》、《维吾尔民间故事》、《维吾尔民间谚语》、《锡伯族民间故事(一)》、《塔依尔与祖赫拉》、《蒙古族民间故事》、《维吾尔谚语》、《阿凡提的故事》、《柯勒木山》、《江格尔传》等。这些作品具有较高的欣赏价值和研究价值:一是作品原汁原味;二是作品没有人为琢饰或加工处理;三是文字朴实无华,富具民间风格。

1978年至90年代初,是我区各民族民间文学作品搜集、整理、出版的高峰期。在这一时期,各类文化机构相继恢复运转,一大批民族文化工作者陆续被“解放”恢复工作,全区各民族民间文化的搜集整理工作又重新开展起来,在较短的时间内搜集整理出一系列具有较高欣赏价值和研究价值的各民族民间文学资料。新疆人民出版社作为当时新疆文化读物出版的中心,在陆续恢复老编辑出版业务的同时,不断充实新生力量,壮大了出版工作者队伍,使该社有了继续承担出版各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雄厚力量。自1978年至90年代初,先后用六种文字出版了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乌孜别克、锡伯、塔塔尔、达斡尔、塔吉克、俄罗斯等民族的民间叙事长诗、史诗、情歌、民间歌曲、民间歌词、民间故事、谚语、格言、谜语、笑话、寓言、歇后语、幽默、神话、神歌、风俗歌谣等200余种。其中不少民族的民歌、长诗、民间故事等作品多为成套或成系列,还有不少各民族的民间故事、民歌、谚语、民间歌曲等的合选集以及单人笑话、单篇长诗、双语合璧作品集等。为了将各少数民族的优秀民间文学作品介绍给诸多使用汉文的读者,新疆人民出版社自1953年始,不断将各少数民族文种的优秀作品译成汉文出版,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此外,各少数民族文种之间也互译作品出版,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起了促进作用。90年代以来,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主持的新疆民间文学“五套集成”的资料也陆续整理、编辑出来,并交付有关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疆各民族的民间传统文化都是在历史上形成、积淀和延续的,它们也会在历史过程中不断消失。挖掘和整理这些文化资料,对认识这些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因此,搜集、整理和出版各民族民间文学资料,不仅是文化部门的工作,而且也是研究民族历史、语言、民俗、文化等各领域的重要任务。新疆人民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充分发挥各民族编辑力量,以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高度负责的精神,在资金允许的条件下,为整理、出版新疆各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做了大量工作,可谓功不可没。

新疆各民族艺术是新疆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广义文化而言)。具体讲,它是各民族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形象反映,也是各民族艺术家知觉、情感、理想、意念综合心理活动的有机产物。从现存资料和遗迹看,新疆各民族的艺术主要表现为音乐、戏剧、舞蹈、绘画、书法、雕塑、建筑等表演艺术、造型艺术和综合艺术。

新疆的传统艺术源远流长。自秦汉至唐代的1000多年间,塞人、匈奴、大小月氏、乌孙、鲜卑、丁零、高车、悦般、铁勒、突厥等在阿尔泰山南北、天山南北以及在伊犁河、额尔齐斯河、塔里木河等河流域或游牧、或耕种,先后创造了草原艺术、城镇农耕艺术。在北疆草原艺术中,岩画、石人、鹿石等为其精华,从中反映了古代游牧部落和部族在劳动实践中创造的绘画、雕塑、

舞蹈等古代艺术。在南疆农耕艺术中,宗教艺术、屯垦艺术占主导地位。清朝以后,新疆各民族的传统艺术形式如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戏剧、文学等,有了很大发展,并逐步异化和更新。尤其是随着当代影视艺术及现代各媒体日新月异的发展,使新疆各民族及地方传统艺术正面临日渐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鉴于此,抢救、整理、保存这些艺术形式成为当务之急。然而,传统艺术资源的搜集、整理、维护、抢救是一项多头并进的工作,其中出版对这项工作的意义非常大。数十年来,新疆人民出版社、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等为此做了很多实质性的工作,先后出版100余种具有资料价值和学术意义的新疆各民族及地方艺术读物。主要有:《新疆唐代歌舞艺术》、《哈萨克民间图案集》、《叶浅予舞蹈画册》、《新疆维吾尔民间花帽图案集》、《新疆歌曲选》、《新疆蒙古族民间小调歌曲》、《丝绸之路造型艺术》、《丝绸之路乐舞艺术》、《新疆岩画》、《伊斯兰建筑》、《吐鲁番风情画集》、《维吾尔民间图案集》、《柯尔克孜民间图案集》、《锡伯族民间图案集》、《维吾尔民间建筑图案集》、《维吾尔文书法》、《维吾尔族乐器》、《克孜尔千佛洞壁画故事》、《古代新疆的音乐舞蹈与古代社会》、《维吾尔族民间图案纹样集》、《格图肯书法集》、《敦煌建筑》、《龟兹石窟研究》、《敦煌图案》、《龟兹佛窟人体艺术》、《岩画与生殖艺术》、《新疆壁画线描精品》、《库车龟兹佛韵乐都风情》、《中亚古代艺术》、《满文美术字》、《中国吐鲁番民间图案纹饰艺术》、《中国新疆古代陶器图案艺术》、《维吾尔十二木卡姆(1-12)》、《新疆古代雕塑辑佚》、《库车库木吐拉石窟》、《丝绸之路岩画艺术》、《丝绸之路艺术研究》、《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格图肯书法新作》、《西域艺术通论》等。从上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人民出版社和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不断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和智力,为抢救、整理、出版新疆各民族及地区传统艺术资源做了大量工作,可谓功在当代,惠及子孙后代。

文化交流是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国与国之间有关知识、信息、科技以及思想、观念、道德、礼仪等相互进行传播和交流的人文现象。其中国与国之间出版物的引进、翻译和出版,以及本国之内各民族文字读物的互译出版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方面,也是文化传播的有效形式之一。特别是在偏远落后省区及少数民族地区,上述两个层次的译著出版活动在文化交流方面的功能和作用更为突出。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各民族群众在脱离愚昧状态、初步摆脱文化贫困、获取外面信息、提高思想意识方面,靠的主要就是这一文化传播形式(即把各类汉文读物译成少数民族文字读物)。如新疆人民出版社在1951-1965年出版的六种文字的5000余种读物,其中60%即3000余种读物均为译自汉文的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锡伯文种读物,门类包括政治理论、毛泽东著作、哲学、法律、经济、文化教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历史、地理、医药卫生、科技以及中小学各类教材等。译自国外的著作只有个别苏俄文学作品。

1978年以后,随着我国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日益加强,大量不同文种的文学艺术、文化教育、科技卫生、历史、地理、哲学、经济等方面的读物不断被引进,给出版系统翻译出版创造了条件,尤为新疆各族人民带来了了解国外思想文化的机遇。20余年间,我区各出版机构尤其是新疆人民出版社以翻译出版世界文学名著为契机,先后用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等文字翻译出版各类译著近200种,囊括了各国最流行的名著。如:《一千零一夜》、《格兰特船长的女儿》、《欧也妮·葛朗台》、《好兵帅克》、《堂吉珂德》、《爱丽丝奇遇记》、《双城记》、《简爱》、《基度山伯爵》、《黑奴吁天录》、《惊婚记》、《驴皮记》、《十五岁的船长》、《成吉思汗》、《包法利夫人》、《悲惨世界》、《海底两万里》、《红与黑》、《浮士德》、《爱玛》、《古莱什少女》等。汉文版也有部分历史、文化、文学艺术等类译著出版,如:《喀什噶利亚》、《西域文化史》、《中亚简史》、《丝绸之路》、《西回鹘国史》、《五代回鹘史料》、《鲁达基诗集》、《克莱默夫妇》、《井上靖西域小说选》、《西域探险考察大系丛书》、《亚洲探险之旅丛书》、《天山游记》等。在新疆各民族文字之间互译出版成绩也是很大的。首先,由汉文译成维吾尔、哈萨克等文字方面,也是以汉族古典名著和当代流行小说为牵头,取得了较大成绩,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红岩》、《沸腾的群山》、《敌后武工队》、《青春之歌》、《创业史》、鲁迅著作多部单行本、《林海雪原》、《暴风骤雨》、《金光大道》、《李自成》、《红旗谱》等。其次,先后出版了诸多少数民族文字与汉合璧或英俄文字与少数民

族文字合璧的有关科技、教育、语言、法律、经济、人名、历史、地理、医药等方面的大中小型具有编译性质的工具书，并成为新疆出版文化的特色领域。再次，改革开放 20 余年来，也出版了诸多由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和锡伯（满）文译成汉文的有关文学（包括民间文学和创作文学）、古籍等方面的译著。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传统出版体制开始动摇，我区译著出版已难以为继，只保持着文学等几个门类畅销的译著（且主要为译自汉文的民族文字读物）出版；而译自外文的汉文译著，其数量少之又少。

新疆地方及各民族形式多样的古籍，是其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这些古籍散存于各民族民间及各图书馆等收藏部门。新中国成立后，以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为契机，对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了一次基本审视和了解，并对其中的古籍文化加强了认识。在新疆，通过该调查的逐步深入以及自治区民宗委古籍办公室的陆续调查、搜集，各民族丰富多彩的古籍逐步被发掘，使新疆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真面目逐步显露出来。古籍与文物一样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过去对古籍的文化价值认识不足，以及它们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与功能未能深入认识，甚至将其视为旧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而加以摒弃，使各民族文化遗产受到莫大损失。古籍的载体性质又说明了这一文化遗产的存在形式是很脆弱的，其毁失与历史时间成正比。古籍的损失还要受诸多人为因素的影响，在国民素质低下和文盲普遍存在的经济落后国度里，文化遗产的价值很容易被忽视或无视。在我区，诸多地方和民族古籍文化遗产因长期得不到财力、物力的支持而自然消失，或沉睡于少数人手里。

古籍的整理和出版是文化建设中的重要项目之一。古籍整理付出较高、工作难度大，也是一项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在新疆这个多民族地区，古籍整理、出版更突出地表现为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抢救和弘扬，以及对新疆地域文化的抢救、保护和延续问题。因而任务繁重、意义重大。

新疆各民族和地域性古籍文化丰富多彩。从目前见到的资料分析，其门类繁多、数量丰富、文种有别、历史长短不一、体裁和内容多样。门类涉及政治、哲学、军事、民族、宗教、文学、艺术、文字、语言、历史、法律、民俗、外交、考古、地理、财经、医药、教育、天文、水利、综合等等。古籍文别有突厥文、回鹘文、察合台文、摩尼文、于阗文、粟特文、焉耆——龟兹文、回鹘式蒙古文、满文、汉文、藏文、俄文等。从历史长短而言，自汉末至清末民初各代基本都涵盖。体裁和内容又丰富多彩，如游记、历史专著、经卷、诗歌、小说、散文、剧作、民间故事、谚语、辞书、函电、文牍、碑刻、题词、壁画、岩画、纪实本、契书、人物传记、账簿、言行录、乐谱（乐书）、日记、铭文、陶文等。内容涉及自汉代前后至清末民初在西北地域概念范围内出现的各部落、各部族、各民族及一些外来民族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宗教、文学艺术、语言文字、文化等各方面。

20 世纪 80 年代初，作为新疆唯一的综合性出版机构——新疆人民出版社不容辞地独担起了古籍整理、出版的繁重任务，自 1981 年开始了纯粹意义上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当年维吾尔文推出了《突厥语大辞典》第一卷（后几年出版第二、三卷）；汉文出版《真理的入门》。1982 年汉文出版《〈明实录〉瓦剌资料摘编》。1983 年锡伯文出版《三国之歌》。1984 年汉文出版《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锡伯文出版《喀什噶尔之歌》。1986 年汉文出版《贯云石作品辑注》和《五代回鹘史料》。1987 年蒙古文出版《蒙古秘史》；锡伯文出版《锡伯族历史资料拾零》。1988 年汉文出版《旧中国新疆石油史料辑要》。1989 年维吾尔文出版《安宁史》；锡伯文出版《敦吉纳见闻录》。1990 年锡伯文出版《萨满歌》。1991 年汉文出版《元代维吾尔哈刺鲁资料辑录》。1994 年汉文出版《新疆与俄苏商业贸易档案》；锡伯文出版《锡伯营职官年表》。1997 年汉文出版《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4 种）。2002 年汉文出版《西域图志校注》。2003 年汉文出版《〈明实录〉新疆资料辑录》；锡伯文（锡汉合璧）出版《盛京移驻伊犁锡伯营镶红旗官兵三代丁册》。2004 年汉文出版《锡伯族古籍资料辑注》。此外该社还为满文（满汉合璧或汉满合璧）古籍的整理出版做了很多工作。自 80 年

代初以来,共安排出版了20余个品种。如:《来自辉番卡伦的信》、《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满汉合璧)、《古文观止》(汉满合璧)、《三国演义》(1—4)、《锡伯(满)语词典》、《旧清语辞典》、《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1—2)、《劝学篇》(汉满合璧)、《古文观止》(续集·汉满合璧)、《满语入门》(汉满合璧)、《满文美术字》、《西游记》(1—3)、《六部成语》(汉满合璧)、《西厢记》(汉满合璧)、《满文教材》(满汉合璧)、《诗经》(汉满合璧)、《古文》(汉满合璧)、《聊斋志异选译》(汉满合璧·上中下)、《单清语》、《满汉辞典》、《新满汉大词典》等。

新中国成立50余年来,新疆出版业除了在上述五个领域的成绩表现突出外,在民族文化、宗教、辞书等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先后出版了六个文种或不同文字(含英、俄等外文)合璧的数百个品种,其中新疆人民出版社做出的成绩仍然最突出,反映了该社在新疆出版领域始终保持的中心地位、出版导向作用和雄厚的编辑势力。

四

新疆出版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至今已形成六个文种、门类齐全的具有民族文化特点的出版系统。在数10年的出版经营实践中,以新疆人民出版社为中心的各出版机构,为发展各民族文化,弘扬新疆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先进文化以及为自治区政治、经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回顾50余年来的历程,既有辉煌发展的时期,又有曲折中前进的时候;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值得吸取的教训。认真总结和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对我区出版业今后的良性发展可以提供帮助,也为人们留下深入思考的空间。下面根据我区出版业在各个历史阶段表现出的问题,提出笔者的几条认识,以求与广大出版工作者共议。

(一)新疆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又是边疆多民族地区。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经济、文化和思想意识落后的状况虽有大的改观,但与中东部尤其是沿海一带相比差距仍然很大,而且差距正在越来越悬殊。历史地看,落后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更重要的还体现于文化的差距。经济发展,文化也跟着发展,文化发达会促进经济快速发展,落后文化会拖经济发展的后腿。因此,在欠发达的多民族地区,发展民族文化与发展经济具有同等重要意义。作为我区出版业,从其担负的社会职责和义务而言,把握好出版方向,摆正好出书定位,事关巨大,意义非凡。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尽快改变各民族思想、文化愚昧落后状况,先行成立的新疆人民出版社数年内全力以赴,用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四种文字安排出版各民族干部群众亟需的各类读物,四五年中,各族人民就是读这些精神产品逐渐脱离了思想文化的“贫困”,各类出版物的社会效益得到了切实有效的发挥。改革开放之后的十几年中,以新疆人民出版社为主的各出版机构,顺应各民族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全面发掘各民族及地区文化出版资源,先后出版了具有较高文化和知识积累价值的各类读物数千个品种,形成了我区出版物厚实的品牌体系,使我区的出版业表现为最繁荣辉煌的时期。各族干部群众通过这些文化产品对各民族的历史、文化等有了全面的了解,其整体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民族出版业的繁荣发展又极大地推动了我区人文科学、文化教育等事业的快速发展。从上可以看出,民族地区的各出版机构尤其是“人民社”,在出版工作中必须把握正确的出书方向和定位,必须将民族文化及地区文化作为重要出版资源。正确处理好图书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问题。否则,出版工作必定会走弯路。这已经被出版实践所充分证实。

(二)出版行业的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违背了这个规律,其出版经营工作就会出现挫折。因此,从宏观上对整个出版系统的管理以及各个出版机构自身的管理工作就显得非常重要。出版社的工作中心是编辑出版工作,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因为一个出版机构其行政性工作无论搞得如何有声有色,而编辑工作处于次要地位从不被重视,总编辑等出版社领导成天沉浸于事务性工作,编辑部门生产不出有价值的读物,那么,该出版机构不可能有什么成绩,也显示不出其文化价值。在这方面,新疆人民出版社的历史就有代表性。该社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之后十余年间的出版经营活动,切实有效地发挥了其社会效益,之所以能够如此,就是因为这个时期该社将编辑出版工作放在了首位,将其作为中心工作进行了落实。本社在其出版经营实践中,也

曾存在编辑工作不被重视，职能部门工作成为出版社的中心工作，出版经营严重滑坡，图书的社会效益被严重忽视的情况。而这个时期恰恰就是出版社的工作本末倒置、出版社高层的管理思想和理念严重颠倒的时期。从此表明，一个出版社的工作能否取得社会（包括作者、读者等）认可的成绩，关键在于出版社领导层的管理思想和理念要符合出版社自身的运行规律，在出版工作中本末置正，要树立出版社的一切工作为编辑出版服务的思想，社领导要带头抓好选题策划工作。否则，出版业自身的发展规律是无情的，它将不称职的管理者会毫不留情地推出该文化领域的。

（三）我区 50 余年来的出版实践充分证明，出版社的中心工作是编辑出版，而编辑出版的核心是编辑队伍。因此，提高编辑队伍的各项素质（包括政治、理论、知识素质等），对一个出版机构而言关系非同凡响。因为知识（文化）积累性和文化含量较高的出版物品牌体系是一个出版社得以存在的生命，也是体现其业绩的唯一硬性指标。而产生这些品牌体系的关键因素，就是编辑队伍的综合素质和所付出的复杂劳动。加上各级领导层的支持也是能够形成品牌体系的关键之一：“出版品牌图书能否取得成绩，与出版社高层领导尤其是总编辑的知识水平、选题策划能力和文化意识关系极大，何时领导有了这些素质和能力，何时就有品牌读物不断被推出，否则就是成绩平平。”（《新疆出版改革与实践》第二辑 144 页）审视我区各出版机构尤其是新疆人民出版社其出版状况较好且大量推出品牌读物的良好时期的编辑队伍情况，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编辑队伍和领导层的理论知识性素质都比较高，都有程度不同的写作和创作能力，对案头工作都比较专注或具有很强的责任心和事业心，能够对编辑工作进行不断钻研，能够吸引各学科的作者队伍及慧眼识优秀作者和选题。如果没有那些各方面素质都比较高的编辑队伍和领导层，那么 20 世纪 80 年代后我区出版业繁荣发展的局面是不会出现的。90 年代末之后我区的出版业普遍出现了具有民族性、地区性文化价值的图书出版难和图书各方面质量日趋下降的局面。这一方面与出版体制转型和全国的“大气候”有关联，而且还与编辑队伍整体素质和领导层管理水平的下降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一个出版社想打造或继续打造自己的品牌体系，想创造厚实的出版文化，想保持和稳定自己的作者队伍及读者群，就得想方设法先提高编辑队伍的各项素质、各级领导的管理水平和领导才能。

（四）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出现的我区出版业繁荣发展局面，给了人们一个很大的提示，即之所以出现那么个令人鼓舞的可喜局面、取得那么大的出版成绩，是因为当时的出版方针实实在在地置于我区地域性出版资源之上，使一批地方和民族历史系列、民族文化系列、地方和民族资料系列、民族文学艺术系列、文化教育系列、各文种的译著系列、各类辞书系列、语言文字系列等具有较高欣赏和收藏价值的出版物，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但是，我区民族文化出版事业正在继续向前发展之际，因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所带来的出版体制转型时期到来，我区地域性文化出版的繁荣发展局面随即中断，进入了各出版机构开始大量出版关内“自费书”的阶段。近 10 年中，我区具有民族和地方特色各类读物的出版受到了大范围限制，给我区的文化发展造成了较大影响。自 2004 年始，通过党和国家的宏观调节，上述情况已经得到基本控制，我区出版业尤其是“人民社”正处在调整转型之中。在这关键时期，各出版社特别是新疆“人民社”，应很好总结和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充分把握目前的有利时机，调整出书结构，转变观念，重新审视各自的地位，重塑各自的文化形象。在这方面，新疆人民出版社更是有重塑自己文化形象的客观基础，因为该社长期以来在作者队伍和读者群中树立的文化品位和形象，以及扎实的编辑队伍，使其在发掘和整理我区传统文化和民族优秀文化，推动和发展我区人文科学理论，以及为我区“两个文明”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其他出版机构是无法替代的。在今后的出版经营活动中，本社应在发掘和利用地域性出版资源上多下功夫，力求将以往的损失补回来。这也是党和国家对“事业”性“人民社”的期望所在。目前，我区地域性出版资源中，待深入挖掘的方面还有很多，如历史、民族、文学、艺术、地理、语言文字、宗教、教育、经济、军事、法律等方面，都有资源可继续挖掘。

（五）在一个形成自己厚实的出版物品牌体系和较高的文化品位的出版社周围，必定形成自己

优秀的作者队伍。他们是出版社的宝贵财富，是提升出版社文化品位的中坚力量，也是出版社的出版业务之所以能够不断向前发展的智力基础。我区 50 余年来的出版实践证明，一方面是出版业造就了区内外一代又一代各民族作者队伍（包括翻译队伍），另一方面是这些作者队伍帮助出版机构取得了今天的辉煌成绩，也是他们使我区的出版机构不断发展壮大，达到了今天这个规模。从该意义上言，作者与出版社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出版社对老作者要百般呵护和尊重，对新作者要尽力培养和提携，更要积极主动地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做到对所有作者都要一视同仁，力求最大限度地留住他们为我区出版业服务。实际上，一个作者对一家出版机构来说始终是个不确定的因素，今天可能是你的作者，明天也许会成为他的作者。因为作者对一个出版机构的信赖程度，不仅要看其文化品位和诚信度，还要看它编辑队伍的状况，即整体素质低下的编辑队伍或编辑个人，不可能得到高水平作者的信任，更不可能长期留住作者，那么，要造就自己稳定的作者队伍就会失去基础。

一个出版机构要想做到持续发展，想以出版物品牌体系培育和扩大读者群，除了摆正出书定位、提高编辑队伍和出版管理水平外，造就和不断壮大优秀作者队伍也是关键之一。所以，出版社一定要造成一种上上下下发现作者、培育作者、团结作者、呵护作者的崇高文化氛围，要让所有出版人都深刻认识到作者队伍对出版社的极端重要性。这样才能够吸引一批又一批作者团结在你的周围，你的事业才能够不断向前发展。

综上所述，我区出版业的发展已有 50 余年的历史。在这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各出版社的发展情况既有共同之点，又有各自的特点，要全面总结经验教训，非四五条所能概全，而是需要铺陈诸多头绪。但是，事关每个出版机构荣辱兴衰的要件，大致有一定的共同性，尤其是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诸多出版社更有共同之点。所以笔者认为，上列五条，对我区各出版机构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尤对新疆人民出版社更有引以自检的价值。

参考文献：

- 《新疆人民出版社图书目录》（1951—1989），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 李春华主编：《新疆出版改革与实践》（1—3 辑），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1、2003、2004 年版。
- 贺灵：《新疆地域文化中不容忽视的出版文化》，《新疆新闻出版》2003 年 2 期。
- 佟克力：《新疆人民出版社与满文古籍文献的整理出版》，《民族古籍》2004 年 4 期。
- 贺灵：《“人民社”的出书定位与编辑素质问题刍议》，《新疆新闻出版》2005 年 1 期。
- 贺灵：《新疆民族文化与地域性出版资源》，《新疆新闻出版》2005 年 2 期。